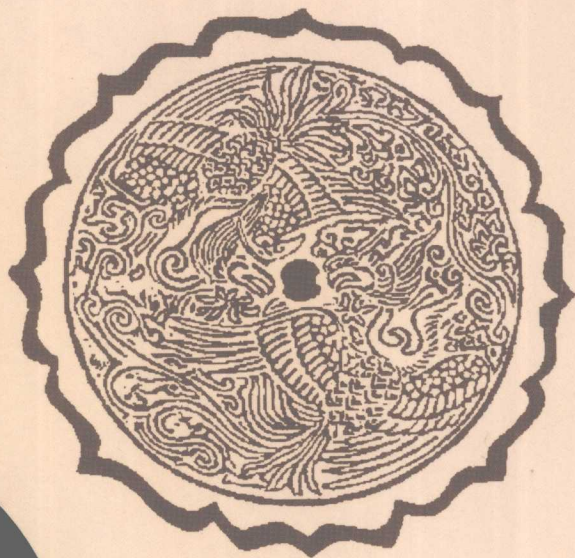


【主编 朱瑞熙 王曾瑜 蔡东洲】



SONGSHIYANJIULUNWENJI

宋史研究论文集

(第十一辑)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【主编 朱瑞熙 王曾瑜 蔡东洲】

宋史研究论文集

(第十一辑)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史研究论文集. 第十一辑/朱瑞熙等主编. -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06. 8

ISBN 7 - 80659 - 874 - X

I. 宋... II. 朱... III. 史评 - 中国 - 两宋时代 - 文集 IV. K244.0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1704 号

宋史研究论文集(第十一辑)

朱瑞熙等 主编

责任编辑 黄云生
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
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
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网 址 www.bsbook.com
发 行 巴蜀书社
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电话:(028)85011398
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203mm × 140mm
印 张 19.375
字 数 450千
书 号 ISBN 7 - 80659 - 874 - X/K · 146
定 价 45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安丙 学术研讨会开幕词(代序)

朱瑞熙
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专家学者：

由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政府、西华师范大学和中国宋史研究会共同主办的“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安丙学术研讨会”，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。来自全国(包括香港特区)以及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等国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、这次会议的特邀代表等，共90多位，欢聚一堂，切磋学术，这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宋史、南宋史、四川历史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。

这次会议在全中国人民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，在邓小平同志的故乡、东川地区的一颗明珠——四川广安市召开，有着特别的意义。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、改革家、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、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，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中国人民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

立了不朽的功勋。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,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,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光明前景,中国学术界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的新风气和繁荣景象。中国人民爱戴他,感激他,怀念他,我们这次会议正是我们历史学界同仁纪念他、缅怀他的一种很好的方式。我们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,继续学习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——邓小平理论,不断深入钻研探索,不断创新。

自从前年八月在甘肃兰州市召开第十届年会以来,两年时间里,我们中国宋史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据初步统计,(不包括辽、夏、金史方面的)研究专著共有31种(其中香港学者3种、台湾学者1种),论文集13种(其中香港学者和台湾学者各1种),论著目录和人物传记资料索引10种(其中台湾学者1种),通俗读物(带学术性的)5种,宋人笔记和文集点校整理或影印出版140册(近200种),总共已接近260种(170多册)。以上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。这些数字显示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顺利,尤其可喜的是,大家还运用了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,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。

从这些可观的成果中,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:著作者大部分是中年学者,这些学者是中国宋史学界的未来,其中还有几位女士。这些中年学者经过刻苦努力,科研成绩卓著,值得我们放心,并为之骄傲。

同时,在这两年时间里,我们的宋史研究队伍得到发展、壮大,我们的会员已经超过300人。这次年会,还将审批一些新同志加入我会。

以上说明我们的研究会近两年继续蒸蒸日上,预计在今后的两年内将更加兴旺发达。

我们的研究队伍是十分团结的。本着“双百”方针,在有些课题方面,展开了热烈的争论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对于这些争论,我首先觉得应该给予支持,鼓励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进行探讨,各抒己见,这是一件好事。其次觉得应该养成争鸣的风气和习惯。任何一种学术思想、学术观点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反复争鸣,甚至交锋,才能真正领会其意义和影响。学术方面的是非,只能在反复摆事实、讲道理,反复争论的过程中逐步弄清。有些学术问题,限于史料的阙如或不足,也可能永远弄不清,成为千年悬案。当然,总的来说,我们的学术争论还是不够的,虽然彼此有不同的观点,但没能形成真正的交锋,大家更多是自说自话,即使是商榷,也只是蜻蜓点水。

我还觉得应该提倡建立学派,培植学派。20世纪,中国学术界曾经就中国古史问题进行讨论,形成了“西周封建论”、“春秋战国封建论”、“秦汉封建论”、“魏晋封建论”等许多学派。对这些学派的见解我们不用今天的观点去作具体评价,但它们的争鸣确实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史的研究。各地区、各学校、各研究机构可以依据具体情况,开展宋史总体研究,或者在某一方面,如政治、经济、典章制度、军事、历史人物、学术等进行重点研究,形成研究群体和各自的特点。

我们还应该继续鼓励和支持各地区、各单位举办中小型的学术研讨会。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、江苏丹阳市都有举办下一次(2006年)年会的意向,要求强烈,但考虑到江西庐山方面2002年已经提出,庐山的积极性不应受挫。所以我们建议重庆大足和江

苏丹阳或者举办中、小型的研讨会，与年会交错进行，这样每年都将可以召开一次研讨会。诚恳希望各位理事、各位会员一起出主意、想办法，尽可能筹备各种中型或小型的研讨会，活跃我们的学术气氛。

这次会议我们还将讨论决定下次年会的地点和大致时间。现初步考虑2006年在江西庐山举行，组织单位是白鹿洞书院。这次书院派来了黎华副主任作为会议的特邀代表参加研讨会，就是作这个准备。欢迎各位会员到时积极参加。

最后，我谨代表中国宋史研讨会，向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——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政府、西华师范大学，向支持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各位领导，表示衷心的感谢，感谢他们组织了这次盛会和付出的辛劳。

我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！预祝与会的代表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身体健康、心情愉快。

谢谢诸位！

目 录

- 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(以宋代为中心)…… 王曾瑜(1)
- 宋代武官阶类别及其演变 …………… 龚延明(18)
- 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问题探讨 …………… 张邦炜 杜桂英(35)
- 导向的确立——兼谈宋初“欲武臣读书”与“用读书人”
…………… 邓小南(61)
- 论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 …… 陈峰(92)
- 宋代疆界述论 …………… 李昌宪(109)
- “爱元祐”与“遵嘉祐”——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
…………… 曹家齐(123)
- 略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 …………… 贾玉英(135)
- 南宋两浙沿海的水军 …………… 顾宏义(153)
- 宋代的监察机制 …………… 肖建新(169)
- 论南宋史籍有关金卫绍王“遇害”诸记载 …………… 曾震宇(196)
- 两宋士兵逃亡法新探 …………… 张明(218)
- 宋代工商业文明的成长与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
…………… 葛金芳(235)

- “为政不难,不得罪于巨室”——论贾似道的公田法
 何忠礼(253)
- 宋朝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土地赋税政策 刘复生(271)
- 宋人婚龄及平均死亡年龄、死亡率、家庭子女数、
 男女比例考 程民生(287)
-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
 方如金 赵瑶丹(308)
- 朱熹对民本思想的阐释和实践 杨国宜(329)
- 宋理宗端平淳祐经济更化补论 段玉明 邹重华(350)
- 两宋时期的气候变迁新探 张全明(368)
- 宋代人口政策论要 曾育荣(385)
- 两宋京师“皮场庙”考溯 陈学霖(406)
- 宋人著作辨伪 龚延明 李裕民(417)
- 开宋代私家藏书提要目录先河的李淑与《邯郸图书志》
 方建新(432)
- 《东宫备览》“宫僚”条阙页校补及作者陈模家世生平考
 周斌(450)
- 家学传承与学术发展——以宋代四川士人家族为例
 邹重华(461)
- 《宋史》论赞评析 李华瑞(488)
- 蒙文通先生与宋史研究——读《蒙文通文集》
 胡昭曦(508)
- 狄谿卒年考 何冠环(531)
- 五星聚天象与道统天命 韦兵(538)
- 论宋代家训家范特点及其与民间社会控制之关系

.....	杨建宏(547)
论南宋中期四川的重要官员安丙	朱瑞熙(564)
南宋潼川府路·昌州·大足与安丙	陈 灼(584)
安丙家族墓的发现、发掘及价值	唐云梅(595)

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

(以宋代为中心)

王曾瑜

传统与现代是一对时髦的名词,大致相应于古语的古与今。但今人对这对名词的理解,无疑要比古人丰富得多。上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了半复兴,但与先进民族相比,仍处于落后状态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由此对中华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出现各种议论,归纳起来,无非是全盘继承、全盘摈弃或是有选择的继承和摈弃,至于如何选择,又各有看法。

研究中华古史的人,自然是对传统接触最多的群体之一。就我个人的感情和心态而论,其实是矛盾的,有时觉得可爱,有时又觉得可憎。

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走过弯路,在经过了痛苦的反省和思考之后,我终于醒悟到,“从坏的方面看,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便是专制和腐败。专制必然滋生腐败,而腐败又必然依赖

专制。这亦可谓是一对难舍难分、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”^①。“我们民族的坏传统”，“可否概括为专制、愚昧和腐败六字”^②。所谓愚昧，应该包括三个层面，一是民众缺乏文化教育，二是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，三是有文化的统治者也可以做出愚昧的决策。历史证明，绝顶聪明的统治者在某些场合可能利令智昏，做出绝对愚蠢的事。

但是，面对一些力主全盘摒弃传统的议论，我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，都舍不得完全割弃传统，而是主张对传统实行四分法。“五四运动揭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纛，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。但是，当时提出‘打倒孔家店’，不免失之偏颇。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，大致总有好的、坏的、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分。一个民族的进步，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、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，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。当中华民族处于先进地位时，或不免产生自傲感，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；反之，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于落后地位时，或不免产生自卑感，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。更有甚者，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、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，恶性泛滥”^③。

近日阅读《纪念李慎之》一书，此书第173页谈到，李慎之先生“炽爱中国，所以他对拖住中国使之沉沦的势力与习俗十分疾恨”，他认为，“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二千

① 《城狐社鼠》，《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》第590页。

② 《荒淫无道宋高宗》序。

③ 《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》，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》第497页。

二百年以来,一言以蔽之,就是专制主义。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,就是启蒙”,力主进行一次新的启蒙运动。从中华民族的实际状况看,进行一场以批判专制主义为中心的新的启蒙运动,是一种客观需要,是十分必要的。“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,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,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,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”。“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,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,而不能使之终止”^①。但中华文化传统能否简单地“一言以蔽之”,只怕是可以商榷的。

笔者作进一步思考,中华的传统主要可否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?而两者似有所差别。中华文化当然有其优点,否则就不可能创造曾经领先于世的灿烂古文明,也有其缺点,否则就不可能在近数百年间落伍。例如方块字、中医、书法、国画、古乐、民乐、诗词歌赋、戏曲、曲艺、中国建筑园林、中华烹饪等等,都属文化传统,却不一定必须与专制主义挂钩。当然,从另一方面看,中华文化传统也确是以专制主义意识为指导思想,专制主义意识至今仍在毒化中华民族的心灵,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,并认真批判的。

即使就政治传统而论,只怕也不宜将它说得一无是处。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、清正廉明、直言敢谏、举贤任能、忍辱负重、临危授命等好的政治传统,至今为人们所称道。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,也有如范仲淹、李纲、宗泽、岳飞、文天祥等一大批人,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。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,岳飞“文臣不爱钱,武臣不惜命,天下当太平”的箴言,为人们所熟知。但是,若对古史作整体考察,好的政

^① 《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》,《凝意斋集》第301页。

治传统无疑不占主导地位,可以命名为非主流政治传统。至于专制、愚昧和腐败,却在中华古史中占据主导地位,可以命名为主流政治传统。本文主要结合宋代的史实,对主流政治传统再作进一步的揭露、论述和批判,今列举如下。

1. 草菅人命 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说,“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,蔑视人,使人不成其为人”。“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,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,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卷第411,414页)。秦始皇实施“焚书坑儒”,明太祖光是胡惟庸、蓝玉两案即滥杀五万人,清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惨酷的文字狱。中国有一条自古相传的残酷老例,抢江山就不须顾及百姓死活,大量屠戮和虐杀无辜,被视为天经地义。如此之类,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兽性。

宋政似乎有“宽仁为治”的外貌,但宋仁宗天圣诏中也承认司法腐败,“有司巧避微文,一切致之重辟”^①。重辟和大辟就是死刑。史称宋徽宗时,“吏因缘为奸,用法巧文寢深”。宋理宗时,官吏们“擅置狱具,非法残民”,私设“掉柴”、“夹帮”、“脑箍”、“超棍”等毒刑,受刑者“痛深骨髓,几于殒命”^②。宋朝出了如岳飞“莫须有”那样的千古奇冤,体现秦桧意志而上报的量刑,还是将岳云定为徒刑,其实只是削一阶官位,罚铜二十斤,宋高宗却对涉案的九人全部法外加重刑,将岳云超越流刑,定为斩刑,这同样充分体现了专制的兽性。

① 《宋史》卷一九九《刑法志》,另参见《文献通考》卷一六七载宋孝宗乾道五年臣僚言。

② 《宋史》卷二〇〇《刑法志》。

中国人也并非没有强调“人命关天”^①,此种观点正好与草菅人命相悖,但在古代不居主导地位。

2. 禁锢思想言论 是舆论监督权力,还是权力监控舆论,这是民主与专制的重大分野之一。从中国古史上看,禁锢思想言论最大的、影响最深的事件也许是以下五次。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;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;三是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倡议下,将科举改为以儒家经学取士,从此实现了经学、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;四是明朝在科举中采用八股文;五是清朝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文字狱。

禁锢思想言论既有威逼的一手,又有利诱的一手。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。一旦将教育的功能理解和压缩为只是读经而科举中第做官,又进而以八股文取士,这其实是更厉害的禁锢,对中华文明的落伍产生了极严重的影响。胡适曾惊讶于当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施展于古书堆时,西方学者却将其聪明才智施展于自然科学。这无疑是宋明清三代禁锢思想言论的可悲的总结局。直到鸦片战争前,经学仍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学问,最终沦落到坐井观天的地步。

3. 上交谄,下交谀 《周易·系辞下》强调“君子上交不谄,下交不谀”。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,既然实行不同形式的等级授官制,必然会滋生各种等级和特权的制度与思想,只问品级,不论是非,上交谄,下交谀,必然成为混迹官场的第一要旨。今人所谓个人崇拜,其实不是崇拜个人,而是崇拜权势,渴望权势。

^① 元杂剧萧德祥《杨氏女杀狗劝夫》第四折:“从来人命关天关地。”王仲文《教孝子贤母不认尸》第三折:“人命事关天关地。”

《聊斋志异》卷八《梦狼》说：“黜陟之权，在上台，不在百姓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，爱百姓，何术能令上台喜也？”说破了阿谀奉承的真谛。宋徽宗的穷奢极侈，在水天一朝的诸帝中无疑位居第一。当时也有言官批评他“金柱玉户”，但蔡京却作记说，宋徽宗“修真观妙，发号施令，仁民爱物，好古博雅”，“言者不根，盖不足恤”^①。在蔡京所谓“陛下当享天下之奉”的诱导下，众臣“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”^②。更有甚者，宋高宗向杀父之仇称臣，屈辱苟安于半壁残山剩水，竟在一片歌颂声中，被臣僚誉为“书契以来，中兴复古之君，比德较功，莫有望其仿佛者”，“皇帝躬行，过于尧、禹”^③。薛昂“始终附会蔡京”，故两次被援引，当仅次于宰相的执政，“至举家为京讳。或误及之，辄加笞责，昂尝误及，即自批其口”^④。身为执政高官，居然为宰相避名讳，以至自己打嘴巴。

4. 虚饰太平盛世 隋炀帝自夸“华盛”，规定洛阳“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。胡客或过酒食店，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饱而散，不取其直，给之曰：‘中国丰饶，酒食例不取直。’胡客皆惊叹。其黠者颇觉之，见以缙帛缠树，曰：‘中国亦有贫者，衣不盖形，何如以此物与之，缠树何为？’市人惭不能答”^⑤。

宋高宗和秦桧“喜饰太平，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”^⑥。由于古代有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，将灾情、疫情等都视为人间失政的

① 《挥麈录馀话》卷一。

② 《宋史》卷四七二《蔡京传》。

③ 《紫微集》卷一《绍兴中兴上复古诗》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三五二《薛昂传》，《说郛》三七《闲燕常谈》。

⑤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·大业六年。

⑥ 《宋史》卷六五《五行志》。

反映和表现,故秦桧隐瞒灾情、疫情等。“严、衢、信、处、婺、建等州皆大水,士民溺死数万,桧隐而不奏。有闻言者,必罪之”^①。宋时官员隐瞒灾情是有罪的,秦桧不仅知法犯法,反而加罪于说真话者。绍兴十六年“行都疫”,而秦桧的尚书省只是上奏建议“给散夏药”,根本不承认发生了瘟疫^②。虚饰太平盛世而报喜不报忧,弄虚作假,以至不惜劳民伤财,官府马为刀俎,百姓为鱼肉,成为专制政体的一种顽症。皇帝欺瞒胡人,宰相欺瞒皇帝,官员自然也可以欺瞒上司。《朱子语类》卷一〇六谈及地方官,“每常官吏检点省仓,则挂省仓某号牌子,检点常平仓,则挂常平仓牌子,只是一个仓,互相遮瞒”。这是欺瞒上司的一例。

5. 贪污行贿 此类行为史不绝书。应当指出,在专制的人治条件下,一是败露率低,二是败露也未必依法惩处,故贪污行贿必然是低风险,高收益,而敢于触犯刑法者众。皇帝、权臣等经常是此类行为的保护伞。人们公认宋初以重典惩治贪官^③,但是,大将王全斌等平后蜀,恣为不法,“凡所取受、隐没,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,而蜀宫珍宝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,又不与焉”,“百官表言”王全斌等“法当死”,而宋太祖“特赦之”。后来宋太祖又给王全斌复官节度使,说:“抑卿数年,为朕立法。”^④宋高宗时,黄达如“赃污钜万”,而被按劾。但他利用“太后还銮”的机遇上奏,建议将“盛事”“作为歌诗,荐之郊庙”,“将前日异论沮谋者,明正典

① 《会编》卷二二〇《中兴姓氏录》。

② 《宋史》卷六二《五行志》,《宋会要》食货五九之三一。

③ 郭东旭《宋代法制研究》第150页。

④ 《长编》卷八乾德五年正月壬子,癸丑,《宋史》卷二五五《王全斌传》,两处记载的贪污数字不同,但无疑都是巨额贪污。